

浙江文化史话丛书

吴光主编

良渚文化史话

陈白夜 著



宁波出版社

浙江文化史话丛书之二

良渚文化史话

陈白夜 著

宁波出版社

本册著者：陈白夜

责任编辑：马玉娟

封面设计：陈 罡

浙江文化史话丛书

吴 光 主编

* * * * *

宁波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宁波市苍水街79号 邮编：315000

余杭大陆友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5 插页：24 字数：765千

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套

ISBN 7-80602-342-9/K·26

定价：全套 60.00 元 本册 8.50 元

浙江文化史话丛书总序

吴 光

浙江地处中国东南沿海，是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在至少七千年的繁衍生息征途上，我们的先民凭靠其聪明睿智与勤劳勇敢创造了“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古越文化”、“浙东文化”等等名闻遐迩的文化典型，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历史遗产，从而使浙江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无愧于“文物之邦”、“文献名邦”的高雅称号。现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四千万聪明勤劳的浙江人民，正在继往开来地建设一个经济上繁荣开放、文化上多元发展的文明新邦。

处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时期，作为知识界、文化界的成员，我们觉得有责任、有义务去整理和总结浙江七千年文明发展史的原貌与经验，并以历史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批判继承、发扬光大我们先民留下的珍贵遗产，从而为浙江现代化与现代浙江人提供一份可资了解历史、开创未来的资

料，这便是本人和本书编委会诸同仁发愿编纂《浙江文化研究系列丛书》的根本动机。

然而，“人生也有涯，而知无涯”。浙江文明源远流长、绚丽多姿，其史料浩如烟海、博大精深，总结其历史的工作，并非一朝一夕即可完成，更非一人一伙所能竟功。我们这个研究所，是个并无官方拨款而靠民间赞助的学术研究团体，无论在人力还是财力上皆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志大而“财”疏，因此只能量力而行，做一些力所能及而又稍具特色的文化研究工作。于是，我们选择了浙江文明史上最有光彩、最具特色的几个侧面与门类作为研究的突破口，因此，首先集中精力编纂了这套《浙江文化史话丛书》。今后如果条件允许，我们还希望能够组织深入研究浙江文化史的专著丛书。例如《浙江文化名家丛书》、《浙江历代思想家丛书》等等。

本丛书是由本主编组织策划、并与各位顾问、编委反复协商后确定专题、再约请各专题所涉领域内学有专长的中青年学者撰著的。其特色在于，它选择了浙江区域文化中最具特色、最有影响力的几个历史题材为研究对象、以史话为写作体裁、将若干种各自独立成书的小型学术著作合编为一部综合性的区域文化丛书，从而构成熔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的系列历史知识读物。收入本丛书的著作，有总体反映从史前河姆渡文化到清代姚江文化变迁史的《河姆渡

文化史话》，有生动描述人类玉器时代辉煌业迹的《良渚文化史话》，有系统记载浙东学术发展脉络与评述浙东优良学风的《浙东学术史话》，有全面反映浙江地方戏曲之起源、发展、演变状况的《浙江戏曲史话》，有结合实地考察、描述浙江佛教建筑特色和浙江佛教发展演变历史的《浙江佛寺史话》，还有经过专业梳理提炼而生动反映浙江物产特色及其文化内涵的《浙江丝绸文化史话》与《浙江茶文化史话》。

收入本丛书的各部著作，经过各位著者的精心撰著和编者的细心审改，基本达到了“语言流畅、品位精美；图文并茂、雅俗共赏”的要求。著者力求避免泛泛介绍、平铺直叙和史料堆积，而以散文笔调写历史，既写出了所涉主题的发展演变脉络和历史作用，又写出了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及其蕴涵的意义与价值。因此，尽管各册专著在写作风格与技巧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水平不齐、文采有别的问题，然而我敢断言：本丛书是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并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与喜爱！

本丛书在课题策划和组稿过程中，得到了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浙江大学毛昭晰教授以及著名地方志专家、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魏桥编审等专家学者对研究课题的积极支持，并受到宁波出版社社长、总编的高度重视和具体支持。这里还要特别提及的是，我们还得到了台湾南华管理大学及龚鹏程校长、浙江

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及陈文宪总经理、浙江金义集团及陈金义总裁等单位和个人对本研究课题的部分资助。尽管资助的数量有限,但他们支持学术文化研究而不求回报的精神是值得铭记的。借本书出版之机,我谨代表本书编委会和各位作者向上述单位和个人表示由衷的谢忱!让我们再接再厉、携手共进,为正确认识、深入发掘、发扬光大我们浙江七千年文明史所积淀的优秀文化精神、文化传统和文化优势,为在新世纪开创浙江文化发展的新局面而贡献心力吧!

(1998年10月写于浙江中华文化研究所)

1999年6月改定于朝晖寓所)

目 录

浙江文化史话丛书总序

- 一 沉重的历史大门被推开了 (1)
- 二 默默不语的东方金字塔 (15)
- 三 男耕女织立起了两块无字丰碑 (31)
- 四 原来地球上曾有过玉器时代 (54)
- 五 远古的文化留下了难解的刻痕 (85)
- 六 全盛的文化一夜之间没了踪影 (105)
- 后记 (117)

一 沉重的历史大门被推开了

1936年的深秋，来自北方的寒风摇落了在树枝上战栗的黄叶，空荡荡的田间早已看不见一个劳作的农夫，叽喳喳的鸟雀忙着寻觅最后几颗遗落在泥土中的稻谷。就在此时，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沿着田埂从远处走来。

年轻人面容消瘦却显得清峻。他身着一袭长衫，似乎勉强能抵御天末的寒意。他的目光总是落在四周的地面上，好像在寻找着什么。有时，他拾起一片碎瓷，翻来覆去看上一阵，随即又丢掉了；有时，他又捡起一块石头，用手摩挲一阵，不一会儿又弃在地上。直到他来到一个快要干涸的狭长形的池塘边，从潮湿的池泥中抠出几片与池泥颜色差不多的黑陶片来时，他的脸上方露出一丝笑意。

这个年轻人名叫施昕更。在施昕更的记忆中，小时候经常能找到这样的黑陶片。在孩子们的游戏比赛中，不少黑陶片在水面上跳跃几下，留下几个即刻就会消失的圈纹，然后就永远地沉入水底。如今这些黑陶片对施昕更来说，既感到熟悉，又感到生疏。熟悉的是施昕更看到它们便想到了自己的童年生活，生疏的是施昕更总觉得在它们黝黑的颜色下似乎隐藏着什么秘密。

施昕更的父亲是一家南货店的店员，他性情耿直；母亲是农家妇女，虽无文化，却十分地善良贤慧。在施昕更出世后，施家家境已大不如前。施昕更天资聪颖，读小学时，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小学毕业后，他的父亲就不打算让他继续读书了。当时的小学校长觉得施昕更是一块读书的好材料，觉得他就此中止了学业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情，便多次上门劝说，终于打动了施昕更父母的心。他们凑了一些钱，送施昕更到杭州城里中学读书。中学毕业后，家中便再也供不起学费，施昕更只得辍学在家。1929年六月间，西湖博览会在杭州开幕。施昕更经老师介绍，到博览会任讲解员。在工作中，施昕更开始接触辨识各种矿石标本和历史文物，对自然的造化和人类的遗存有了极大的兴趣。第二年，博览会改立为长设文化机构，命名为“西湖博物馆”。施昕更自己请求，又托人介绍，才得以正式进入博物馆地质矿产组工作。施昕更是一个沉默寡言之人，平时勤奋好学，在工作上埋头钻研，不畏艰苦，所以经常得到博物馆领导和同事们的称赞。

西湖博物馆刚成立的时候，馆长之职由陈布雷之兄陈纪怀担任。第二年，陈纪怀辞去馆长之职，正好有生物学家董聿茂从日本归来，接任馆长之职。董聿茂专长生物学研究，对古代的文物不是很懂，但是，他是个心地善良之人，尤其喜欢奖掖后进。施昕更就常常接受他的教诲和指导，受益良多。

1936年的五月间，在杭州西北方向的古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施昕更参加了现场的发掘考古工作。在出土文物中，施昕更见到了一件有孔石斧。这件石斧让施昕更觉得眼熟。他想起了他小时候在邻居家中也曾见过形制相仿的石斧，只不过那时没有人知道它来自何方，

它是干什么用的，它有什么价值，所以从来没有人重视过它，墙角屋后便是它的栖身之处。见到有孔石斧后，施昕更的心底涌动起一个愿望，他极想知道，他在家乡曾见过的那件石斧，如今却在哪儿？它是不是也像新出土的有孔石斧，被磨制得极光滑的斧面上凝聚着数千年前工匠的辛劳和智慧？在古荡的文物发掘工作结束以后，施昕更便告了假，急急忙忙地赶回家去，赶回他祖祖辈辈生活劳作过的地方。施昕更的家乡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把它叫作“良渚”。

在汉语词汇中，“良”与好、佳、美等语词同义；而“渚”是水中陆地的意思。江南地方江河纵横，水网密布，其间参差错落地镶嵌着无数个池塘湖泊。在水的重重复复的包围中，能让人站稳脚跟的干燥的地面便是被称作“渚”的陆地了。在当时给这方土地取名的人的眼里，良渚便是江南水中陆地中最好的一块土地了。

良渚是今余杭市属下的一个乡镇，它大致位于余杭地区的中部，而余杭南依有人间天堂之誉的杭州，北接以鱼米之乡闻名的湖州，境西有连绵起伏的山丘，东有一望无际的沃野。以旧时风水先生的眼光来看，良渚一带背靠西岭翠屏，眼观东海日出，是一块风水宝地。如果把良渚放进更大的空间中去审视，人们不难发现，良渚的地理位置很是特别。它的北面是碧水万顷、包孕吴越的茫茫太湖，它的南面是曲折蜿蜒、潮头拍天的钱塘江，它的西面是重峦叠嶂的天目山脉，它的东面是浩瀚无垠的蓝色海洋。三面环水一面山，便是良渚地区的地势大貌。

在远古的洪荒时代，良渚甚至良渚以北的整个太湖流域地区，长满了大片的森林，而森林的尽处是草原，草原中间有小河流淌而过，也有沼泽或者湖泊处于其中。夏季的

风暴推起汹涌的海浪，直接冲刷着这片陆地。当风暴吹过海浪退去后，这一片陆地上便留下了许多海中生物。在数千年以后的今天，森林、草原和沼泽早已不见，海岸线也向东退去上百公里，但通过专家们考察研究后的描述，当时美丽的自然风光依稀可以想见。

施昕更踽踽独行在当年的这块风水宝地上，他未能找到小时候曾经看到过的石斧，但他收集了一堆黑陶碎片。在黑陶碎片中，有几件略微完整一些的，看起来像是盘子、器皿的顶、陶鼎的足，若用手指轻轻地擦去沾在碎陶上的泥土，陶片表面便会泛出黝黑的亮色来。

施昕更将收集来的黑陶碎片带到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小心地摆弄着，此时，他感到这些碎片可能是古时窑址上的遗留之物，它们历史悠久，但有多久的历史，专长生物学的董聿茂并不清楚。

十二月上旬，施昕更又来到了曾拾到过黑陶碎片的那个狭长形的池塘边，池水已经枯涸。池塘的所在地，良渚人称之为“棋盘坟”。在池塘的淤泥中，施昕更独自一人开始了他的试掘工作。施昕更静静地挖掘着，小心翼翼地除去淤泥，向下探索着。一个星期后，一件又一件的黑陶遗物经过难以估算的岁月，又重新暴露在冬日的阳光下。在出土的黑陶遗物中，最多的是陶豆柄，其次是器皿的圈足，还有大量无法辨明形体的黑陶碎片。挖尽了黑陶碎片后，施昕更发现，在松软的泥土下，似乎还有坚硬的石头。他细心地清除了紧靠在石状物边上的泥土，一把狭长的石刀逐渐凸现出来了。石刀形制粗糙，坚固锐利，当是古人在劳作中实际应用的利器。从黑陶蕴藏的情形看，施昕更估计他所挖掘的这块地方是一个简单的窑址，因为没有发现古人居住生活的任何痕迹。

施昕更的考古发现,不仅大大地鼓舞了施昕更,而且也让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等人大喜过望。在十二月的下旬,馆长董聿茂和历史文化部主任胡行之前往良渚,实地观察施昕更的第二次试掘。

此次施昕更以棋盘坟已经挖出黑陶碎片的地方为中心,向四边开掘。施昕更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全面地了解黑陶的分布范围和期望有古代窑址建筑基础的发现。前后挖掘了四天,施昕更虽然没有发现古代窑址建筑的痕迹,但是,出土的黑陶不仅在数量上更多,在形式上也大有增加。如出土较完整的陶器就有陶甗、陶壶和陶豆等。董聿茂和胡行之看了,方才知,施昕更发现的



图1 施昕更先生像(1912—1939)

的决不是一般的古窑址,发现它的意义可能要比发现古窑址更大。董聿茂指着挖掘出来的黑陶碎片对施昕更说:“这些东西很古,说不定是一个重大发现,你要好好钻研一下。不懂时,可以找些资料看看。”

的确,施昕更已经走入了古代文化的迷宫,面对着自己发掘出来的历史遗物,他迷茫了,他既不知道这些碎片是哪个朝代的产品,也不知道黝黑的色彩下隐含着什么样的秘密。

施昕更带着问题去了浙江省图书馆,查看了许多资料,

其中有一本题名为《城子崖》的考古报告引起了他的注意。

《城子崖》一书中介绍了山东章丘城子崖黑陶文化遗址的发现经过，施昕更深受启发，以为城子崖的黑陶与他所挖掘出的黑陶极其相似，于是，他请教了董聿茂馆长等人，撰写成《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一书。在书中，施昕更表明了他的看法：“杭县的黑陶文化是在东南发展的一支，似无可疑义，最近中央研究院在山东日照县（当作章丘县）之发见，当有连系的关系，杭县黑陶，亦具高矮圈足，钻孔圈足，杯口盖，竖置耳，刻纹轮纹等，文化的特征是相同的，而形制及制作的技巧上看，是比较城子崖为进步，似属黑陶文化的后期，所以比山东城子崖稍晚，然而亦晚不了许多。”施昕更的说法一出，当时人们也都以为良渚的黑陶文化是山东龙山文化的一支了。然而，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

在山东章丘（今章丘市）的西面有龙山镇，龙山镇南有汉代东平陵故城遗址。1928年夏天，吴金鼎为调查东平陵故城遗址，往返于龙山镇和平陵故城之间。在两地的中间，有一块河边台地，平面呈四方形，西边和南边高出地面约有三至五米，远远看去，像一座荒废了的城墙。这座城墙，当地人叫它作“城子崖”。一开始，城子崖并未引起吴金鼎的注意，只是往来得多了，偶然发现了断垣在风雨的作用下，倾落了黄色的表土，露出了里面的灰土，在灰土间有一些陶片。吴金鼎每次路过城子崖，都要去断崖边去查看一番，果然，不久他又发现两枚骨锥。随后，吴金鼎便对西南两面的断崖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在城子崖下层遗址中，他发现了一种并非釉瓷但表面却十分光洁的黑色陶片，在同一地层中，还伴有磨制的骨器和石器。于是，吴金鼎明白了，这块土台城曾是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活动过的地方。

1930年，城子崖古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开始了，世人把关注的目光都投向了龙山这块地方。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进行，精美的黑陶器皿纷纷重见天日，人们便习惯地把这种以黑陶为特征的史前文化叫做龙山文化。后来，龙山文化的含义又大大地扩大了，它没有被龙山城子崖这一地域限制住，因为像城子崖这样的文化遗址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所发现，许多出土文物在形式、制作、用料等方面都与城子崖的出土文物有联系，其所处的时代又基本相同，于是，在全国各地类似城子崖故城的文化遗存都被称作是龙山文化。

在中国，地上地下都有文字明确记载的历史是殷商王朝，此前的夏王朝虽见载于古代史学家的不朽著作中，但从来就没有很牢靠的证据证明它的存在，至于夏王朝以前的历史，就只有关于尧帝舜王的口耳相传的传说了。因为有龙山文化的出现，考古界就顺势提出了“龙山时代”的概念，而这一概念正是涵盖了夏王朝以前的尧帝舜王生活前后的一段时期。

在空间和时间上被确定了这种远古文化，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有值得后人大书一笔的地方，那就是有了人类活动中心——“城”的存在。

人们在城子崖考古发掘中发现，在东周和夏文化地层的叠压之下，有龙山时期的城址。城址平面略呈方形，据测量，其南北长约五百四十米，东西宽约四百五十五米，占地面积有二十多万平方米。尽管四周的城墙早已被破坏，但城墙的基础仍完好地保存在地面之下。城墙的厚度约为十米，当时的建筑者们为了城墙的牢固，在造城墙之前先沿着墙址挖成约有十四米深的沟槽，然后用泥土填埋下去，层层夯实。根据城墙的厚度和墙基的深度，大致可以估算出，原

地表上城墙的高度大约在十米上下,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宏伟的建筑物了。在四面城墙的包围之中,文化的堆积层相当丰富。专家根据探明的如房基、窖穴、水井等遗迹推断,当时城中房屋密集,有的房屋靠城墙而建,甚至有的房屋造到了城墙之上去了,居住在这些房屋中的人数约有五千之多。水井深约七米,井口呈长圆形,井口之大,可以容纳三人同时俯身用吊桶打水。这足以说明,龙山时代的城子崖在当时已是一座文明程度非常高的城邦,是具有国家形态的早期人类的聚集地。

在中原,类似这样的聚集地并非只有城子崖遗址一处,如距城子崖东约五十公里处有了公城址,占地面积约有十二万平方米,值得一提的是,在丁公城址的一个窖穴中,曾发现刻有十一个文字图形的陶片,人们由此知道,龙山时代确已有文字存在了。在山东一地,还有临淄田旺城址,寿光边线王城,阳谷景阳冈城址等,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埋有人与动物尸骨的祭坑,还有被猜测为祭台的经多次夯实的台基,它告诉人们,龙山时代已经有了仪式比较繁复的祭祀神祇的社会活动。既然有祭祀神祇的活动,也就必须有主导这种活动的人,权力(起码是神权)的存在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龙山时代已有如此发达的文化存在,而龙山文化又是以黑陶为文化遗存的重要代表,与良渚出土的黑陶碎片相比较,两者又是如此地相像。施昕更兴奋了,他坚定地认为,良渚的黑陶在时间上虽说要晚于山东龙山文化,但良渚的文化是由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一支文化,对此,他总结出了五点意义:“①可知浙江文化的渊源是很悠久,足以纠正文献的谬误,补充文献的不足。②关于中国文化的独立性方面,确定中国东部沿海胚胎东方固有文化,而东南沿海也

有这种文化的产生或波及。③吴越民族自古为中国文化史上重要之一员，盖可断言。④浙江远古文化程度，因黑陶及石器的发见，确可与中原并驾齐驱。⑤浙江在现代中国经济上文化上无时无刻不占着重要地位的，此项远古文化的发见，认识了浙江远古文化的原始与渊源，补足了空白的一页。”在良渚发现的文化可以与中原远古文化如龙山文化并驾齐驱，施昕更能够揭示出如此重大的意义，但他没能摆脱刚发现不久的龙山文化的影响，最后还是将良渚的文化遗存定名为龙山文化。

良渚文化果真是龙山文化的延伸吗？

在施昕更的记忆中，良渚地区不仅多黑陶，而且还常能见到石器和玉器。就在施昕更发掘黑陶碎片的同时，他发现了石刀、石锤等数件石器。在以后陆续的发掘和收集，还增加了石斧、石镑、石戈、石钺、石矛、石镰、石镞、石铲和砺石等石器种类。更值得一提的是，施昕更自小就知道，在良渚一带，地下多有玉器。农民在掘地翻土时，常会挖到古玉，拿出去卖了，被商贩认作是周秦时代的古玉，能卖一个好价钱。于是，在良渚一带，有几个农民挖玉挖出了经验，知道遇到什么样的土色或挖到什么样的石器便能挖到古玉。施昕更在回乡考察时，也曾专门去拜访过这样的能人，因此施昕更也懂得了，良渚地下的古玉，本是一种墓葬品。墓葬之处有斩沙土和朱红土，这就是标记，值得注意。墓葬有梅花窖和板窖之称，它们排列整齐而有规则。只要打开一口窖，必定是先看到石铲，而石铲下必定有古玉，从来不会搞错的。每挖一窖，都能得到很多玉器，最多的达一百多件。至于玉器的种类和放置的位置，就跟《周礼》一书中记载的差不多：圭放在左边，璋放在头部，琥放在右边，璜放在脚下，璧放在背部，琮放在肚子上。施昕更后来说：“曾汇集